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孟浩然詩集校注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孟浩然詩集校注

〔唐〕孟浩然 撰
李景白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孟浩然詩集校注/(唐)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8.6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3220-5

I.孟… II.①孟…②李… III.唐詩-注釋
IV.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87694 號

責任編輯:李若彬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孟浩然詩集校注

[唐]孟浩然 撰

李景白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6 $\frac{3}{4}$ 印張·2 插頁·335 千字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6000 冊 定價:48.00 元

ISBN 978-7-101-13220-5

前言

孟浩然，唐襄州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生於武則天永昌元年（六八九），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他於兩《唐書》有傳，但均極簡略，對其一生難以詳知，茲據其全部詩作，揣摩詩意，加以排比，可以約略知其行蹤。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爲四個時期：

（一）青壯年隱居與漫遊時期（開元十六年以前）

他幼年自然是居住在自己的園廬裏，以後才到鹿門山隱居，這從《登鹿門山懷古》、《夜歸鹿門歌》兩首詩可以看得出來。他隱居的過程，實際也是準備應舉的過程，他在《書懷貽京邑同好》中說：「晝夜常自強，詞翰頗亦工。」可見他在襄陽隱居時，努力讀書寫作，而達到詞賦工麗，這正是應舉的必要條件。

與此同時，也曾到各地漫遊，他的《望洞庭湖上張丞相》、《彭蠡湖中望廬山》等詩，就是漫遊長江時的作品。他也曾到湘贛一帶遊覽，《湘中旅泊寄閻九司戶防》、《夜渡湘水》等詩，即爲遊覽三湘時的作品。《下瀨石》、《九日於龍沙寄劉大旻虛》則爲遊贛時的作品。漫遊可以增長見識，陶冶美感，從而提高寫作水平，所以它也是跟應舉有着一定關係的。

他在青壯年時期，雖然到各地漫遊，但在襄陽的時間更多，與襄陽地方官吏之間，也不免

有送往迎來酬酢之事，這從約作於開元八年左右的《送賈昇主簿之荊府》、《和賈主簿昇九日登峴山》等詩中可以看出。

他隱居鹿門山時，也常回他的故園，有時也參加一些輕微勞動，如其《田園作》，就是作於他三十歲時。他在《採樵作》詩中寫了他上山採樵的情形，也可證明。

總之，孟浩然在四十歲以前，主要在襄陽隱居，讀書寫作，準備應舉。除了偶然參加一點輕微勞動外，還曾到長江各地漫遊。

(二) 赴京應舉時期（開元十六年至十七年）

《舊唐書》說他「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他四十歲，正當開元十六年，赴京時，正是冬季，有《赴京途中遇雪》詩。開元十七年春季，考試落第。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因為他「晝夜常自強」，而且「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南歸阻雪》），勤奮讀書努力寫作，在當時詩壇上，也頗有好評。為此他十分憤懣、怨懟，索寞無聊，寫下了《歲暮歸南山》、《留別王維》諸詩。到這年秋季，秋雨連綿，使人更加惆悵，《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即作於此時。到了冬天，他在百無聊賴中回歸襄陽。其《南歸阻雪》、《唐城館中早發寄楊使君》、《夕次蔡陽館》諸詩，均作於南歸途中。此外，《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題長安主人壁》、《登總持寺浮屠》、《送袁太祝尉豫章》、《都下送辛大之鄂》諸詩，蓋亦作於長安應舉時期，都反

映了他的生活情況和思想實際。回到襄陽以後，又作了《京還贈張淮》一詩。

(三)漫遊吳越時期(開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孟浩然於開元十七年冬季還鄉之後，小住數月，心情逐漸平靜，但落第的不豫，還是無法排解，遂於十八年又經洛陽轉赴吳越遊覽，追尋山水之樂，以散心中鬱悶。「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自洛之越》)，正反映了他這種心情；而「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表面上是對仕進已經淡漠，其實是落第後的自嘲之辭。

他自洛陽沿汴水東行，經亳州，轉入淮水，進入漕渠，直抵揚子津，有《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問舟子》、《宿楊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楊子津望京口》諸詩。然後渡過長江，沿官河抵達杭州，寫下《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潮作》、《將適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諸詩。他離開杭州，並未直趨越州，而是溯浙江西上，遊覽浙江景物，然後轉赴天台。《初下浙江舟中口號》、《早發漁浦潭》、《經七里灘》、《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宿建德江》、《舟中晚望》諸詩，反映了他在這段途中的情形。其《尋天台山》、《宿天台桐柏觀》、《寄天台道士》則是遊覽天台山時的作品。他在天台山遊覽之後，西北行赴越州，先到剡縣，有《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佛》詩。自剡縣沿上虞江(今曹娥江)赴越州，行抵曹娥埭，轉入鏡湖，有《濟江問舟人》詩，其時約已開元十八年年末。

他在越州遊覽了各地名勝，《耶溪泛舟》、《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大禹寺義公禪》、《同曹三御史泛湖歸越》、《越中逢天台太子》、《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等詩，都是開元十九年春季到秋季這段時間在越州的作品。

他在越州住了八九個月，約在開元十九年秋季，特意赴樂城（今浙江樂清縣）去看望他的同鄉好友樂城尉張子容。他從海路先到永嘉，適其時張子容也來到永嘉，在上浦館相會，盤桓數日，二人同回樂城度歲。到開元二十年，孟浩然再經永嘉返越州，張子容又送至永嘉。《歲暮海上作》、《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除夜樂城逢張少府作》、《初年樂城館中臥疾懷歸》、《永嘉別張子容》諸詩，正表明了這一段經歷。

孟浩然回到越州，張子容又有長安之行，二人於越州又相會，孟有《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詩。從他《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的「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句，可以看出他在越州一帶逗留了兩三個年頭。

隨後他從越州出發，溯長江、經廣陵、潯陽，然後轉入漢水還襄陽。沿途寫了《廣陵別薛八》、《晚泊潯陽望香爐峰》、《自潯陽泛舟經明海》、《歸至郢中》、《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舊遊》諸詩。他回到襄陽，大概已是開元二十一年了。

(四)晚年隱居時期(開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

他從吳越歸來之後，漸入老境，除人蜀作短時漫遊外，都在襄陽隱居。這期間張子容休沐還鄉，二人飲宴唱和，詩作不少。遊蜀之作有《入峽寄弟》、《途中遇晴》、《行至漢川作》諸詩。與張子容有《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同張明府碧溪贈答》、《秋登張明府海亭》、《寒夜張明府宅宴》、《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送張郎中遷京》諸詩。與此同時，韓朝宗曾邀他去面見皇帝，遭到他的拒絕。《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送韓使君除洪州都督》、《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諸詩，就作於此時。

開元二十五年，張九齡貶荊州長史，署孟浩然爲從事。他曾跟隨張九齡各地巡視，或祭祀山川，或遊覽從獵，與之唱和，有《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途經玉泉寺》、《陪張丞相登嵩陽樓》、《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和張丞相春朝對雪》諸詩。約在開元二十六年，他辭去從事。可見這時他對仕進已經興趣不大，再沒有青壯年時期那種氣概了。

開元二十八年，他的好友王昌齡來到襄陽，飲宴甚歡，當時孟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由於食魚，病復發作，「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送王昌齡之嶺南》，蓋其最後之作。

孟浩然終生布衣，與隱逸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無論史學家、文學家談到孟浩然都強調

他的隱士身份，這自然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這當中有兩種偏向：

第一是把他看成渾身靜穆、始終如一、完全純粹的隱士。這可以李白爲代表。其實孟浩然的隱逸，各時期是有不同特色的。在青壯年時期，他的隱逸與讀書寫作、準備應舉密切結合。由於他對應舉具有一定的自信，這時他的隱逸帶有樂觀的、奮發向上情緒。他這段時期的作品，大體都具有一種愉快而開朗的傾向。

到了長安應舉時期，情況起了變化。根據他的寫作水平與當時的聲望，考取一名進士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却意外地落第了。這使他憤懣、怨懟，甚至對當今皇帝流露出不滿，還不免有一些恥辱的心情。如果說他青壯年時期的隱逸是主動的，而又帶有一些浪漫主義色彩的話，那麼他這時期的隱逸却帶有被動和不得不如此的因素。他這時期的作品，具有憤懣不平、怨懟之氣，甚至某種內疚的傾向。

隨着時間的推移，憤懣、怨懟的心情逐漸平靜，然而鬱悶不豫的情緒，一時還難於疏解，於是有三年的吳越之遊，以尋求山水之樂。他這時的作品，既多寫山水之美，却又經常地流露出隱逸之情，在這個時期裏，他的隱逸是伴隨着山水之樂的。與此同時，他也並未完全忘情仕進，在越中他不止一次地表明了「未能忘魏闕」的想法。這裏我認爲除了表明他並未忘情於仕進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青壯年時期，準備應舉，爲什麼沒有這種話語，而在遊越時期

反而再三地如此表白？我以為這是由於應舉落第，一時氣憤，詩作之中，表現出決絕，甚至對皇帝有不滿情緒。時光不斷流逝，心情逐漸平靜，也感到有點無味甚至過分，因而才有這種一再表白。他這一時期的詩作，大多具有平靜、淡泊，甚至帶有一點開朗的傾向。

遊越歸來之後，漸入老境，已進入晚年時期，這時他的隱逸與過去幾個時期又有所不同。過去的隱逸，儘管結合着各種不同情緒，從而各具特色，然而糾纏着仕進，却是共同的。而這一時期，他已不再考慮仕進，所以韓朝宗邀他赴京，面見皇帝，也遭到他的拒絕。可見，這時他的隱逸倒是比較純粹的。

第二個偏向是強調他隱逸與仕進之間的矛盾。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大概是聞一多先生，以後有些文學史便沿用了這個觀點。但我以為他的隱逸雖然在相當長的時期，伴隨着仕進，可是並不矛盾，因為孟浩然的隱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儒家雖然積極求仕，然而也是講隱逸的。孔子就說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見（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都表明了儒家是根據不同情況來處理「隱」與「仕」的關係，兩者是和諧統一的，而不是矛盾的。

孟浩然的詩，今存二百六十餘首。就其思想內容看，所反映的生活面，是比較狹窄的。但

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首先，他雖然隱逸，但有着積極用世、報效國家的壯志。他的詩裏，不止一次地提到「鴻鵠志」、「壯圖」、「壯志」。他的「壯志」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按《秦中感秋寄遠上人》的「黃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看，「壯志」當然指的是功名仕進。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功名仕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有的人追求功名仕進是爲了光宗耀祖，有的人則是爲了發財致富，有的人則是爲掌握權力，欺壓百姓，有的人則是爲了濟世安民，致國家於富強等等。那麼孟浩然追求功名仕進的目的又何在呢？這在他自己的作品裏，表現得不那麼明顯，不像李白要求自己「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也不像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那樣明確。但從他的詩歌中，互相印證，還是能看出他的「壯志」、「壯圖」、「鴻鵠志」的基本內涵。

他在《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舊遊》中說：「余復何爲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這是他遊越歸來之後，回憶進京應舉的本意，表明了他「忠欲事明主」的思想。古人把「君」看成是「國」之象徵，「忠君」即所以「爲國」，他的「魏闕心恒在」、「未能忘魏闕」都具有同樣的含意。

再從他所推崇的人物看。他在詩中一再提到屈原，「三湘弔屈平」，「弔屈痛沉湘」，他

憑弔屈原，崇拜屈原，表明了他也有愛國愛民的心迹。再從他歌頌爲國從軍的戰士看，他的《送陳七赴西軍》詩說：「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凱還。」他認爲陳七在國家有事時，爭先從軍，是「鴻鵠志」，並與自己赴京應舉互相比附，在他看來，文武雖爲兩途，但爲國却是一致的。他在《送告八從軍》詩中又進一步說：「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好勇方過我，才多便起余。……正待功名遂，從君繼兩疏。」認爲只要能爲國做點事，不一定非要讀很多的書，把爲國家做貢獻放在首要地位，並且還表示願與告八一起功成身退。他還有直接表示憂民思想的詩，如《田家元日》：「我年已強仕，無祿尚憂農。」從這些詩作中互相印證，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壯志」，實際上包含了爲國爲民的思想。

其次，他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悲憤；對政治上的黑暗，表示了不滿。他這種思想開始於應舉落第之後。他入仕無門，憤怨地發出了「北闕休上書」的呼聲，甚至指責玄宗李隆基「棄」掉了他。他逐漸悟出了一個道理：埋沒人才，不單純由於皇帝的「不明」，更重要的還由於官僚制度與官場的黑暗。他在《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詩中說：「豈直昏墊苦，亦爲權勢沉。」這詩作於落第之後的幾個月，心情的苦惱，固然與「苦雨」有關，但更大的苦惱，卻在於「權勢沉」。如果說「權勢」二字，在這首詩裏還有些朦朧，那麼在《留別王維》詩裏就十分

明確了。他說：「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在《田園作》詩裏，更進一步地說：「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爲揚雄，一薦《甘泉賦》。」在《送丁大鳳進士舉》也說：「惜無金張援，上空歸來。」總之，他清楚地認識到他的落第主要由於朝中無人，沒有高親貴友的援引所致。他憤怒抨擊當時的社會是「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他又借道士雲公的口指責當時的社會是「物情趨勢利」（《山中逢道士雲公》）。他對當時官場的混濁，社會的黑暗，是帶有憤懣之情的。

他對懷才不遇的人，表現出深刻的同情。他在《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中說：「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遙情每東注，奔晷復西馳。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張子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對好友傾吐心中積愆，感情是十分真摯的。他以賈誼自比，賈誼雖有才能而無法施展，自己又何嘗不是有着類似的遭遇！時光流逝，年齡漸老，常有無所作爲而悄然沒去的恐懼。但看來這似乎又無法避免，便只好歸之於「命」了。他在《洛中訪袁拾遺不遇》中說：「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用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典，以袁拾遺暗比賈誼，表明了對袁的推崇，而袁的懷才不遇，引起了孟浩然深刻的同情。宋劉辰翁評此詩爲「便不着字，亦自深怨」，是很有見地的。

第三，他歌頌重然諾的俠義精神和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司馬遷是推崇俠義精神的，

故於《史記》中專爲游俠立傳。序文云：「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這話講得相當全面，既指出游俠的缺點，又熱情洋溢地歌頌了他們的可欽佩的一面。孟浩然對於這種俠義精神是表示欣賞和贊揚的。他在《醉後贈馬四》詩中說：「四海重然諾，吾嘗聞白眉。秦城游俠客，相得半酣時。」其《送朱大人秦》詩云：「游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看來馬四、朱大都是游俠一類的人物，他歌頌了他們「其言必信」、「已諾必誠」的性格，又以饋贈寶劍的行動，表明了對俠義之士的傾心。

他的詩中有一篇《贈蕭少府》，贊揚蕭少府做官能够出汙泥而不染，能够不與世俗同流合污，說他「處腴能不潤，居劇體常閒」；稱贊他堅決鏟除奸詐，使得世風、吏風都有所改變，「去詐人無諂，除邪吏息奸」；贊揚他的心地純潔，有如「明月在澄灣」。對蕭少府的贊揚，實際上是贊揚了高尚的品德與純潔的心靈。

第四，他寫了大量的山水詩和一些田園詩，這在他全部詩中佔有最大的比重，也最能代表孟詩的風格，歷來稱孟浩然爲山水田園詩人，就是根據這種情況說的。

在山水詩中，他雖然流露出一些消極情緒，然而主要的還在於歌頌祖國大自然山河優美的景色以及田園的樸質風光，給讀者以美的享受，質樸的熏陶；反映了唐代部分中小地主階

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情趣和他們的理想與追求。我們無妨以《彭蠡湖中望廬山》為例：

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黯黯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寄言巖棲者，畢趣當來同。

這首詩固然有消極隱逸思想，然而所描寫的山河優美壯麗，予人以深刻的印象。讀這首詩的人一般說來是不大注意那點隱逸思想的，而對於廬山、彭蠡湖的色澤美、雄壯美則會不期而然地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對祖國山河產生熱愛的感情。

他的田園詩的數量大大少於山水詩，其最著名者，有《過故人莊》，詩中稱「田家」為「故人」，故人相「邀」我即「至」，而最後兩句，大有不邀自來之勢，這一切都說明作者與田家的親密無間，與勞動人民能建立這種質樸而純真的感情，是頗為難得的。

此外，從《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可看出他是與「老圃作鄰家」，並且還和老圃一道種瓜。其《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云：「余意在耕鑿，問君田事宜。」表明了他是很注意農事的。其《田家元日》云：「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採樵作》云：「採樵入深山，山深樹重疊。……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烟歸。」這都說明他參加過輕微勞動，他與勞動人民感情的融合，便是以此為基礎的。

唐玄宗是「盛世明主」，但也是「衰世昏君」，所以孟浩然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由盛轉衰的時

代。在「政治清明」的背後，隱藏着黑暗與危機，在「社會升平」的背後，隱藏着不平與混亂。孟詩對這種現實是有所反映的，對一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追求，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孟浩然生活比較簡單，除了四十歲進京應舉外，基本上過的是隱居與漫游的生活，所接觸的人物也不多，主要的是官吏、少數的是道士、和尚與農民，一句話，生活面比較狹窄。這反映到他的詩裏，便是內容不够豐富。宋代的蘇軾批評孟浩然的詩是「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後山詩話》引）。蘇軾所謂「才」，不知指的是「才學」、「才情」抑或是「才華」，根據「韻高」看，似乎指的不是「才情」與「才華」，再從後面的「材料」看，似乎指的是「才學」。古代文人強調讀書，把「書」看成為創作的源泉，他所謂「才短」，可能就是指的這方面。清施閏章的評語，可作注腳。他說：「坡公謂浩然詩韻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良是，然坡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為詩何獨不然？」（《螭齋詩話·詩用典故》）他稱坡公「多料」是因他胸中有「萬卷書」，可見蘇軾批評孟浩然「才短」、「無材料」是指孟浩然讀書少。這裏嚴羽的話還可以作為佐證。他說：「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他認為孟浩然詩之所以高於韓退之的原因，是在於「妙悟」。嚴羽以禪喻詩，他的見解是否準確，姑不置論，但他所說的「學力」，與蘇軾所說的「才」、「材料」，當為一意，亦即讀書之謂。但是我們說，如果「才」、「材料」指思想內容、生活內容，那

倒是更爲合適的。

下面我們再看一下孟詩的藝術風格。

孟浩然的詩，在唐代頗有好評（見附錄），這些評論，大都是從藝術角度出發的，足見唐代評論家跟我們今天在評詩的標準上是有所不同的。明確地說，唐人評詩重在藝術，而我們今天則偏重思想。思想是應該重視的，但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把思想性強調到「唯一」的地步，從而取消了藝術性，那就不對了。我們知道詩歌是藝術，詩人作詩，體現了詩人對於美的追求，創造出優美的意境，豐富人們美的生活情趣，只要這些詩篇不是鼓吹反動思想，那就應該從美學的角度上予以肯定。

如前所述，孟浩然的作品中山水詩佔有最大的比重，這自然跟他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他在各個不同時期裏，漫遊是他生活的重要內容，名勝古蹟，古剎道觀，無不盡情遊覽。就是在襄陽隱居時，萬山、峴山、望楚山以及漢江、北澗、峴潭都是他經常登臨的處所。他對山水有着濃厚的興趣，在各種場合，他似乎都不會忘記山水。他在《聽鄭五愔彈琴》詩中說：「余意在山水，聞之諧夙心。」於《經七里灘》詩中說：「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在《夜登孔伯昭南樓時沈太清朱昇在座》詩中說：「山水會稽郡，詩書孔氏門。」在《登望楚山最高頂》詩中說：「山